

奇報出版



歷史與現場

韋安仕◎著 霍達文◎譯

香港新貴現形記

香港易主，明珠色變
既得利益階級如何在新政局中周旋？
新貴又如何趁隙攀附，扶搖直上？
且看駐港 14 年的韋安仕冷眼利筆，
刻劃香港社會菁英的榮衰浮沈！

香港

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

STEPHEN VINES

中譯本序

我想，也許會講中文的讀者想像一個西方人寫一本以中國為主題的書時，總會有點異樣的感覺。我顯然沒有資格評斷這種異樣的感覺是否合理。但我認為，香港這個主題不完全是個中國的主題。事實上，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它地方，就是因為香港有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對香港歷史的影響並不亞於中國人的影響。

這一點解釋了我何以不自量力寫這本書，而且還歡迎中譯本出現。我也相信，作為一個在香港住了一段長時間的外來者，我為這個題目帶來一個新的觀點，而這和華人作家所持的觀點是不一樣的。我不是說這觀點比較高明，而是這只是一個不同的觀點。

假如有人宣稱，我寫這本書其實發自一種對昔日英國殖民統治的緬懷之思，或如某位讀者所說，我只是在哀悼英人統治的過去，我將強烈抗議。相反地，我絕不相信君主統治適合一個進入新千禧年的現代社會。



我對中國堅持以殖民方式統治香港——雖然不是以一個外國政權的身分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感到非常不安，原因即在此。這本書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不到一年就出版了，當時有些讀者認為，我把香港視為中國的殖民地，可能有點言過其實。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內，都想不到新政權竟然會花那麼多氣力建立一個和昔日殖民時期有那麼多共同點的新政府，雖然這個新政府有新的外表和新的旗幟，但是，香港很快就走上一條從英國殖民統治到新殖民統治的路子。

我現在仍住在香港，對這個地方仍有強烈的戀繫之情。我希望有人證明我錯了，即使那表示我花了很多時間寫一本書，而這本書的主題反而透露我對香港現狀有根本的誤解，那我也心安理得。不幸的是，情況並非如此。也許有些人覺得某些事情對於身為作家的我是好事，但這些事對香港人絕不是好事。香港人有權要求更理想的政治，也有權要求中國實現大談「光榮回歸祖國」時所作的承諾。

有人宣稱，香港被一些本身無法控制的情況驅離了原來的方向。他們指出，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那是英國國旗在最後一個殖民地降下的翌日，泰國政府決定讓該國貨幣貶值，結果觸發了亞洲的金融危機。

這危機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後果，香港也無法置身事外，很快就被捲入亂局中。在其它地方，這危機趕跑了腐敗的政府，特別顯眼的是印尼，南韓和泰國也不例外。香港的政府經歷了這場危

機之後灰頭土臉，再三顯示經不起考驗。

假如香港政府能夠在經濟上有所表現，也許可以建立起比較好的信譽，但很不幸，港府主持的是卅年來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局面。其實港府的信譽未必會因此受損的。同一個地區的政府在經歷了這次危機之後，雖然經濟受到嚴重打擊，但信譽反而大增。在新加坡，從新加坡獨立以來就開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可說威權主義是其第二本性，但新加坡政府明白必須權力下放以及使經濟制度自由化，然後才能生存。台灣是唯一建立民主形式政府的華人社會，但卻沒有發生經濟不景氣，也沒有由威權統治所扭曲的經濟制度導致的問題。經過這次危機之後，執政黨國民黨可說反而改善了體質，雖然這個政黨也許還要面對執政時間過長引起的後果。

在香港，政府卻閉塞得很，拒絕察納異見，反而迅速動手破壞使這個前殖民地得享繁榮的放任主義經濟制度。當然，新的統治者未能徹底推翻前政權留下的龐大制度。但這些新的統治者插手干預股市、期貨市場和匯市，並著手制訂產業政策，蠶食香港的自由市場體系。社會大眾不覺得有什麼高明的地方。

新政權還倒行逆施，回歸專制政府最惡劣的特性，而且更以專橫的方式為之，社會大眾當然更感失望。恢復了昔日殖民時代的委任制度，而不是透過選舉產生的代議制度，而且此一制度的復辟方式使人覺得，批評政府的人在公共事務中沒有任何席位。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首長董建華是政府的首腦。他的作風有如一名舊式的總督一樣，喜歡讓一小撮應聲蟲和叩頭蟲包圍著他。他在公共場合出現往往徒具形式，他和社會大眾接觸時，總是有一大群官員簇擁著。董建華出席某些聚會，而又不能保證與會人士向他的一舉一動鼓掌時，這些官員總是團團包圍著他。所以董建華的風評不佳，而且其支持率遠在末代總督彭定康之下，也無足為奇。但這卻是後殖民時期首開先例的。

問題並不局限於政府作風的問題，而且還牽涉到實質問題。新政權希望確保在沒有有效反對勢力的情形下統治香港。這本來已經很讓人質疑了，更有甚者是港府破壞法治的方式。法治是英國殖民政府留給香港的資產，幾乎每個人都同意，這是使香港成功的主因之一。雖然當初中方曾信誓旦旦的承諾香港的法制將維持不變，但法治還是受到破壞。這承諾的唯一例外是原來香港的終審法庭是倫敦（英國國會）上議院，日後將改為設在香港的機構。當時卻沒有人承諾，新的終審法庭將名如其實，是香港的最高法院。

不幸的是，香港終審法院在獨立自主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領導下，把自己的職責看得太認真了，而且還對香港政府的保證照單全收，於是毫不猶豫地在裁定一項關於香港居留權問題的官司中，作成了一項讓政府敗訴的裁決（這在其他司法權獨立的地方並不是聞所未聞的事）。這起訴訟案牽涉到香港人在中國大陸所生子女的權利問題。基本法——即香港的小憲法——明文規

定，這些港人的子女有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居住，但香港政府宣稱，假如容許他們行使此一權利，將有一百七十萬人從大陸越過邊境，蜂擁而至，要求居留。此外，香港政府也質疑終審法庭解釋基本法的權利，而且還迫不急待地越過終審法庭向中國人大常委會求援。於是香港得到承諾的法治獨立，一下子就遭到沈重打擊，而且很可能是致命的一擊。

政府破壞法制，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看來，威權主義的本能是這種統治方式的部分本質，而另一方面政府也狂妄到自以為唯有它本身才知道什麼是對香港最有利的。新政權拒絕承認反對意見是施政過程的正當內涵，原因即在此。

本書將談到香港建立的新選舉制度，該制度旨在確保最得民望的候選人無法在立法會中成為多數。立法會議員當選之後不能提出改變政府政策的動議，也不能提出和公共支出有關的建議。即使立法會議員可以克服這些相當嚴重的掣肘，他們還得面對立法會內的表決方式。這表決方式確保由少數選民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可以隨時推翻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提出的動議。

在稍低的施政層次，新政權取消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兩個擁有行政權力的民選機構。再往下一個施政層次是區議會。區議會本來最多只有顧問性質，但運作時一向比較直言無諱。在新政權掌權前，區議會是唯一由普選產生的機關，所以毫不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區議會裡頭盡是不合行政當局脾胃的人。為此，新政府重新引進委任制度，使民選區議員無法自動成為多數。



於是，香港不但沒有加入亞洲其他國家向高度民主邁進的行列，反而大開倒車。有人猜想，新政權此舉並不是配合北京新主子的意願，而是在號稱比教宗更堪稱天主教徒的董建華帶領之下的特區政府主動爲之。這就是皈依新信仰者的行事方式，他們須要以此自明。假如我們說，新政權主要是由皈依新信仰的人組成的，其中只有少數是有操守的例外，而這些皈依新信仰的人都是對舊秩序忠誠的人。

香港最讓人感到欣慰的地方是，香港人並不覺得他們的新主子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會上他們的當。這是一個不容易生存的地方，居民泰半是移民，他們選擇了自己的命運，然後繼續生存，他們能夠承受很多，但要用空言搪塞他們可不容易。雖然代議制度已漸遭到蠶食，法制以及言論自由也受到挑戰（其方式是暗示傳播媒體自我約束），香港仍保留了自由的氣氛。

一般而言，香港人並未給嚇住了。而且平心而論，政府也知道最好不要打壓言論自由，雖然港府已經朝這方面有了一些動作。碩果僅存的言論自由得到充分發揮。在電台的廣播節目中，在報紙上，在街頭巷尾，人們還是暢所欲言。在紀念一九八九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結束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周年紀念活動中，香港人不把香港的領袖放在眼裡，成千上萬的民眾紀念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者，並大聲疾呼，要求民主。

所以，香港並非已經全盤盡墨。香港人的精神不容易被擊潰，特別不容易被主政的三流政客

和官僚所擊潰。這些政客和官僚企圖使舊式的君主統治復辟，但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的蔭庇之下，他們終歸是會失敗的。一時之間，他們會成功，但這勝利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原因是香港見過太多世面，經濟也太高度開發了，是不會甘心接受二流政府的。

香港和其他曾經是外國殖民地的地方不一樣，香港注定不能走上獨立之途。但從來也沒有人說過，其他遠遠沒有香港進步的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自立，而香港這個現代化而先進的社會卻應該重新接受某種形式的殖民統治。

當然，假如有人說香港已經成了中國的殖民地，香港的新統治者肯定不能接受，而且也肯定會招來新朝新貴背後支持者的厲聲譴罵。但本書要證明的卻是，中國為香港設計一套制度，其指導原則是要保存殖民形式的統治。再者，香港新政權採取各種行動恢復了一些最糟糕的殖民陋習，目的就是要確保北京領導人口中的「祖國光榮統一」成為一種使香港這新得之物受到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方法。

也許有人會說，用「殖民地」一詞描述香港的新情況並不適合。論者肯定會說，殖民關係必須是一個遙遠的外國強權和受到殖民統治的人之間的關係。這種論調，假如過去受到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加泰隆尼亞人和巴斯克人聽到，乃至於在凱瑟琳大帝統治下俄羅斯帝國以及後來蘇聯境內的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以及烏克蘭人聽到，一定會覺得非常訝異。仔細



看看香港的情況，中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這種說法，對於西藏人來說也一定不會覺得荒謬。一如其他受過殖民統治的人一樣，香港人在種族和其他方面和實行殖民統治國家的人民都有關連。但香港人也和其他受過殖民統治的人民一樣，他們的獨特的語言和生活方式和他們殖民主子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也不同。

以香港的情形而論，這類比不能推論過當，原因是中國重新統治香港之前一段長時期，香港已經有一股深刻的中華民族主義存在，香港人也和中國大陸其他中國人認同。但這正是關鍵所在，香港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多少認同感，也對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少認同感。

一九八九年有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民主示威看來好像可能在中國促成另一種政治制度，當時香港人盡量提供助力。這一刻已成過去。示威遭到殘暴鎮壓，香港人只有集體哀悼。骰子擲出去了，米已成炊，大勢已定。香港要回歸祖國，受到祖國的高壓統治者宰制，而這些手段高壓的統治者短期內難望有什麼改變。

我在一九八七年抵達香港，當時是在英國和中國簽署協定同意把主權移交中國之後的兩年半。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在那麼多年前就知道自己將為歷史見證。為此，我特意寫日記和記筆記，記述英國統治香港末年和中國統治初年如何一幕一幕的展現。本書大部分內容的依據就是

當時的紀錄。

這是一部充滿希望，充滿失望，也充滿不肯定的紀錄。我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過去十幾年來，我在香港扎根很深，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在這裡有一個家，不是一個租來的家，不是一個我接到通知就得搬走的家。我在香港也有一點生意。所以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命運是有一點具體牽掛。我對這個地方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對那些企圖要把這個活躍的社會變成較沒有自由以及較沒有主見的人，我有強烈的反感。

但我畢竟是一個外國人。換言之，不論我在香港居留多久，我永遠都是一個外來者。我可以從一個和我的中國友人不同的角度看香港，我這些華人友人在香港有比我更深的根。這也許表示，我和他們有足夠的不同之處，使我可以看到他們看不到的東西，但同時我也可以看到像過客般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寫一兩本書的外國人所看不到的東西。

我眼中的香港是中國的新殖民地，但這不表示香港將永遠如此，也不表示隨著中國的改變，中國殖民統治的性質不會徹底改變。

這本書的起點是個個人的觀點。我要描繪的是生活在新香港的實況，以及等了十年等待主權易手的經驗。我從個人觀點審視導致英國統治結束的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特別是在過渡時期中在一九八九年間希望旋起旋滅的轉捩點。



在本書往後的各章，我要談的是在新秩序中的各個要角，我特別集中注意力在掌權的董建華身上以及拿他和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作個比較。彭定康是一個很厲害的政治人物，他花了不少精力把他的人格烙印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上。

現在香港的情形是由一些趨向、政策以及一些舊秩序核心人物促成的。我覺得，要了解香港的現在和未來，我們得先看看這份紀錄。所以我花了不少篇幅在這上頭。

在本書比較後面的各章主要談的是新香港所受到的壓力及其重大問題。換言之，我們將仔細的看看香港經濟、投資、傳播媒體、法制以及其他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命運的問題。

我寫作本書時得到很多人的協助。可惜我無法一一列舉幫忙最多的人的名字。他們有些還在政府或商界服務。我擔心假如他們和這本書扯上關係將會受到傷害。為此，我覺得假如我只列舉幾個幫過忙的人，這有點讓人覺得討厭，原因是這只會引起錯覺。但我並不是對他們的幫忙全無半點感激之心。我真希望我能謝謝他們花了時間和精力，有時還不免氣惱，幫我使這本書面世。

這番話講了這麼多，但我想特別提出一群人。他們並未直接幫忙我寫這本書，但他們提供了很多資料和深刻的洞見，這些資料和卓識不難在本書的字裡行間發現。我說的這群人是《東快訊》(Oriental Express)的舊同事，他們都是很卓越的新聞同業。我還要特別向施漢德致謝。本書得以寫成，他幫忙的地方比任何人都要多。在倫敦，負責編輯本書的是奧倫出版社(Aurum Press)

的安妮卡・阿爾弗瑞茲（Anica Alvarez）。她對本書的寫作計畫鼎力支持，對不妥當的地方目光如炬。當然，假如本書還有錯漏的地方，責任還是由本人承擔。

二〇〇〇年三月 香港

前言 再次活在殖民地

再次活在殖民地

每個住在香港的人對他們開始自覺到在中國統治下生活，都有不同的經驗。

我有個朋友是公務員。她說她從辦公室往窗外看，看到中國五星旗在政府合署門外飄揚，才猛然覺醒。另一位友人則說，他看到郵筒的皇家徽號被移除時才如夢初醒。

我本人則可以很確切地說出猛然醒悟的時間和地點。時間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早上大概五點鐘，說是中國統治的黎明是很恰如其分的。當時我剛離開外國記者俱樂部不久。外國記者俱樂部的氣氛頗為低沉，經過昨晚的活動還沒有倒下來的人在據案大嚼高卡路里的早餐。到達外國記者俱樂部之前，我曾驅車前往邊界，觀看中國解放軍的勝利入城式。

我帶著一夜無眠的疲累轉到下亞厘畢道，那就是政府的總部，稱為政府合署。我抬頭看了看政府合署大門醜陋的混凝土門廊，看到工人正在懸掛起中國紅色和金色的國徽，拿走原來高踞在



這座醜陋建築物正中央的王室徽號。

我無法解釋我何以覺得這一幕比在傾盆大雨中進行的儀式更真實。幾小時前，我在這儀式中目睹英國正式揮別香港。我也不能說，午夜時分英國國旗在新落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項肅穆的儀式中降下，中國國旗在電力產生的風中飄揚這一幕是我意識到現實的一刻。

這些儀式一如電力產生的風一樣不真實。英國國歌最後一次演奏，使人感到振奮的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刻板的演說，以及經過細心編排的軍操，了不起也是一場表演而已。

真實是什麼，是看到一個象徵擁有一座建築物的徽號。我曾多次進出這建築物訪問公務員。在這建築物之內，我參加了幾十次冗長的記者會及和政府人員會面，這些場合的氣氛和英國某個大型市政府的情形幾乎一模一樣。磨損了的辦公室家具，悶得發慌的職員，除了偶爾端著茶杯走來走去的公務員就幾乎空無一人的長廊，以及塞滿了文件的棕色卷宗，現在完全落入新主人手裡。

一九九七七月一日香港發生的事完全沒有歷史先例。沒有一次主權移交經過麼長的預先安排好，更不消說是一種革命性的主權移交，把一個自由放任的社會的主權移到一個中央集權，而其領導人自稱是共產黨人的國家手中。

大部分歷史事件都是突如其來的，大部分的主權易手之前會發生戰爭，而這些戰爭多半是內

戰。譬如說，有誰能預見蘇聯的迅速解體，有誰能預見在二次大戰之後出現一個共產主義中國呢？但香港的巨變是以秩序井然的方式出現的，是按照巨變發生前十三年所簽訂的條約進行的。這條約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廿六日草擬，在同年十二月十九日簽訂，一年後由雙方政府批准。

中國實現了夢想，滿雪外國佔領領土的國恥，收回人民共和國最繁榮的一塊土地。英國則鬆了一口氣，實質上結束了現代史上最大帝國最後的一章。這個帝國只留下一點微不足道的殘渣，對主持英國外交政策的大人物來說不外是一點點惱人的事物而已。至於香港人，根本沒有人和他們商量這項決定他們命運的條約，於是他們對未來沒有什麼把握，他們有點興奮，有點惶恐，但對於得到欽點的香港人來說，未來卻充滿了機會。

十三年的等待行將結束之際，事情接二連三發生，使人感覺有點急迫。不知不覺間，六月卅日馬上要來臨了，原先看來還很遙遠的接收，或中國口中的光榮統一，轉瞬間就迫在眉睫。

我看到中國國徽在政府合署懸掛起來後不到一小時，就到了最接近中國大陸的社區上水。香港只有幾條大型公路，我在其中之一開著車，幾乎看不到車窗外的景物。大雨傾盆而下，雨刷（譯按：香港人稱為雨撥）也無能為力。在傾盆大雨偶爾放緩時，我看到的是一片混濁灰黯的黎明景象。

是不是有些不太友善的力量在撥弄事情？倘若確實如此，這股力量對時機的掌握真的很了



不起。前一天晚上，連綿不斷的陣雨已經帶來不少雨水，到了英國樂隊開始演奏《天佑女王》時，雨勢陡然轉大。中國統治香港的第一個星期，大雨下個不停，帶來的雨水比過去近百年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

中國委任的臨時立法會主席范麗泰煞有介事的宣稱，這場大雨為香港滌淨了過去一個半世紀的英國帝國主義。其他樂觀的人則援引口國典故，遇水即發，宣稱雨水對於任何繁榮的事業都是一項好的徵兆。但這場雨使許多戶外的慶祝活動無法舉行，而且引起坍方（譯按：香港人稱山泥傾瀉），沖走一尊有名的佛像。沒有人硬說這是吉兆。

七月一日清晨，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濕漉漉的開端引起山泥傾瀉和積水。但上水的街道卻擠滿了等著歡迎中國軍隊的民眾。

在邊界另一方的深圳，中方自然熱烈地為解放軍送行。這主要是中方當局精心安排的。在香港的一方卻未見什麼安排的跡象，雖然地方議會也鼓勵市民早起前往迎接駐軍。許多早起的人都獲贈紙製的中國國旗和洋紫荊花紋的特區區旗。到解放軍抵境時，這些紙製的旗幟已經揮舞不起來了，但還是有人很興奮的搖著。

政界人士曾多次告訴我們這些新聞從業人員，香港人對解放軍進駐都感到疑慮，原因是他們在一九八九年殘暴鎮壓民主運動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當時中方派了四千名軍隊，加入比他們早